



《大唐西域记》在古代中国的流传与影响

□ 曹刚华 刘海杰

《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是唐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归国后奉敕著述的一部西域史书。该书为贞观三年（629年）至十九年玄奘的西行见闻，记载大量西域山川交通、历史传说、神话故事，是研究古代西域、印度宗教信仰，中外交通、风土人情等的重要文献。季羨林称它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高峰，在中国史学和世界史林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见证。但它在古代中国的流传并不是一帆风顺，也经历诸多起伏，方成为世人皆知的一部中国经典。

唐之前的王朝对遥远的西域了解不多，仅有的知识来自《史记》《汉书》等典籍，缺乏实地资料。贞观十八年（644年），一心开拓西域边疆，但苦于毫无资料的唐太宗得知玄奘回国的消息，即派遣左仆射房玄龄、右武侯大夫将军侯莫陈实等将其迎入长安。随即唐太宗在洛阳官仪鸾殿召见玄奘，迫切询问西域地理交通、风土风俗等事，并郑重嘱咐玄奘编撰一部关于西域的史书，可见他对这部西域见闻记寄予厚望。

贞观二十年（646年），《大唐西域记》编撰完成。玄奘在《进〈西域记〉表》中极力褒奖了此书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大唐疆域广阔，超越前代，文治武功的盛世必须载入史册。该书看似西域风土人情的记载，实则是大唐福泽四海的最佳见证。

但此时唐太宗刚征伐辽东失败，心情郁闷，再加上李勣平定西域，诸部“乞置汉官”遣使朝贡^①，西域边疆态势尚有所好转，《大唐西域记》的现实意义随之下降。故唐太宗在《答玄奘法师进〈西域记〉书诏》中除盛赞玄奘的高风亮节、求法艰难外，对《大唐西域记》只简单写道“当自批览”。

唐初官方对《大唐西域记》的流传仅见于赠送西州刺史鞠智湛、供王玄策出使西域使用、编修《西域图经》三处，民间社会更无迹可寻，可见其流传不广。

唐中晚期，随着文人士族、百姓僧众对西域认知渴望的加深，《大唐西域记》在唐中晚期社会的流传有了新的变化，影响逐渐增强。这一时期，《大唐西域记》逐渐进入文人士族的视野，笔记小说、经史典籍或直接引用《大唐西域记》，或以此创作文学、考证史地。元和年间刘肃以唐初以来名士言行纂成《大唐新语》，其中《记异》篇记载玄奘身世行迹、求法翻译史事，并简要介绍《大唐西域记》的情况。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记载，天宝年间中岳道士顾玄绩事迹，亦以《大唐西域记》所记婆罗痾斯国救命池之说佐证其真实性。可见，《大唐西域记》已进入中唐文人士族视野中，成为文坛常见的史料，为世人熟知。

《大唐西域记》在中晚唐广泛流传。唐传奇的繁盛刺激了文人士族、精英分子对西域知识猎奇的渴望。唐传奇由志怪小说演化而来，中唐时进入创作高峰阶段，它以“变异”“传奇”为主要议题，内容奇幻、情节离奇，具有超脱现实的丰富想象力。隋唐时期胡风兴盛，影响颇深，中唐时达官贵戚、文士民众对西域文化的了解探求达至热潮，记载有西域风物、域外传说、神话故事的《大唐西域记》作为西域实录与异域文学的完美结合体，被传奇作者青睐有加，其中的西域故事传说被改造成入唐传奇之中，更能引起文人士族、民众百姓对《大唐西域记》的好奇与追捧。

唐以降，《大唐西域记》更加广为流传，它的真实记载、古怪离奇的民间故事、绚丽多彩的域外风情，以及简扼流暢的文笔，都令人读来妙趣横

生、精彩纷呈、爱不释手，在佛教僧众、文人士族、普通民众中广为流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焦竑《国史经籍志》、丁仁《八千卷楼书目》等私人藏书目录多著录此书。《大唐西域记》的丰富内容甚至还为明代吴承恩创作中国经典神话小说《西游记》提供了创作灵感和历史基础。这些都表现出宋元明清时人们对《大唐西域记》具有浓厚的兴趣。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促进纸本文献传播进入了“大发展”时代。宋元明清时《大藏经》仿效《开元释教录》，多收录《大唐西域记》。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与发展，宋《崇宁藏》《资福藏》《碯砂藏》、金《赵城金藏》、元《普宁藏》、明《洪武南藏》《永乐北藏》《径山藏》、清《龙藏》以几何级速度在古代中国社会中传播。这些《大藏经》均收录有《大唐西域记》，便利了此书在古代中国的流传，促使更多人看到《大唐西域记》。

其次，宋元明清佛教世俗化的加深使文人民众接受佛教文史作品成为一种常态，使《大唐西域记》在宋元明清的广泛流传成为可能。宋元明清佛教最大的特点就是佛教世俗化进一步加深，社会各阶层的佛教信仰者众多，佛教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上至帝王皇室、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多有信佛之人。正如宋代陆九渊说：“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说皆足以动人，士大夫鲜不溺焉。”亦如陈垣评价明代士绅喜爱佛教所言：“万历而后，禅风寝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至于百姓信仰佛教之风更是盛行，人们纷纷以烧香拜佛、布施斋僧、念经抄文、吃素放生等方式来表现信佛之心。尤其是明代佛教复兴后，文士群体阅读佛教书籍

成为潮流，《大唐西域记》随之受到重视。明人周嘉胄《香乘》以《大唐西域记》介绍龙脑香等物产。《戒庵老人漫笔》比对婆罗痾斯国隐士与杜子春故事。这些都与宋元明清佛教世俗化加深有很大关系，进而影响到《大唐西域记》的流传。

最后，随着明清西域边疆问题再次成为焦点，记载西域风土人情的《大唐西域记》亦成为官方关注西北问题的参考文献。如清《四库全书总目》称《大唐西域记》“侈陈灵异，尤不足稽”，但“山川道里，亦有互相证明者”。清代学者也多借此书考证、勘误西北名物、史地，如金永森《西被考略》、李光廷《汉西域图考》、魏源《海国图志》、俞浩《西域考古录》等书均大量征引《大唐西域记》史料。晚清时期，张之洞因“要典雅记、考求论定”，为士子作《书目答问》，也将《大唐西域记》列入子部释道家必读之书。这些都表明《大唐西域记》在宋元明清仍然广为流传，受到官方和文人士族的关注，为宋元明清的文学创作、西北史地的考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大唐西域记》后世传入日本，汉学家儒莲亦将其译为法文，流传于全世界，《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文明沟通的见证。可以说，《大唐西域记》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时代与疆域，也为中外文明交融共生提供了优质案例与历史启迪。



《训俭示康》：俭能立名，侈必自败

□ 王 杰

北宋名臣、史学家司马光一生清廉节俭，正道直行，严于律己，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司马光生活的年代，社会风俗日益变得奢侈腐化，人们竞相排场、比阔气，奢侈之风盛行。为使子孙后代避免蒙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和侵蚀，司马光特意为儿子司马康撰写了《训俭示康》，以教育儿子及后代继承发扬俭朴的家风，永不奢侈腐化。

《训俭示康》先写司马光自己年轻时不喜华靡，注重节俭，现身说法，言真意切。接着写近世风俗趋向奢侈靡费，讲究排场，与宋初大不相同，列举了李文靖、鲁宗道、张文节三人的节俭言行加以赞扬，指出大贤的节俭有其深谋远虑，而非侈靡的庸人所能及。进而引用春秋时御孙的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从理论上说明“俭”和“侈”所导致的必然后果，使文章更深入一层。最后连举六名古人和本朝人的事例，又以正反两方面事实为据进行对比，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俭能立名，侈必自败。末尾以“训词”作为结束语，点明题旨。全文说理透辟，有理有据，旨深意远，反复运用对比，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第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在司马光看来，节俭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美德，奢侈不只是一种陋习，更是一种罪恶。节俭是一切美德中最大的德，奢侈是一切恶行中最大的恶。司马光精心选取了六位古人及一名当朝者的成败荣辱事例，耐心细致加以点评，作为史学大家，他善于以人为镜，以史为鉴，用深邃的历史目光观照现实，指出尚俭崇廉，是事业、人生的福祉，而奢侈纵欲，则是败家、丧身的祸端。

俭之为德，由来已久。上古尧舜之时，就对节俭的作用给予高度肯定。相传虞舜曾称赞夏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大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吃粗米饭，喝野菜汤，穿粗布衣，住茅草屋，为后人所称道。春秋战国时期，在生活观念上几乎一致“尚俭”。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他认为，节俭自持，是富裕安康的前提条件之一。孔子也主张温良恭俭让，把俭看作是人的五种美德之一，强调以节俭为本，“礼，与其奢也，宁俭”。墨家更是进一步提出了为人从政都要节俭的思想：“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节俭则昌，淫佚则亡。”还提出了适度消费的理念，倡导在衣食住行中加以贯彻。秦汉以后，人们普遍接受儒、墨两家的观点，二十四史中对于能够节俭的人物大加称赞，随处可见。《后汉书·吴祐传》称“祐以光禄四行迁胶东侯相”。所谓“四行”，是指“敦厚、质朴、逊让、节俭”。节俭为“四行”之一。

优秀的品质总是如影随形。节俭往往会催生廉洁，而廉洁亦会提高威望。为官者把俭朴和廉洁的关系理清楚了，节俭戒奢，戒奢从俭，以俭养廉，也就掌握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法宝。因此古时官吏的升迁考核，常将能否“节俭”作为一项基本内容。

第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告诫后人，由节俭转入奢侈是容易的，由奢侈转入节俭就很难了。这句话反映了人们在物质生活条件改变后心理和行为上的适应性问题。当生活环境改善，享受更好的物质待遇时，人们往往会很快适应并追求更高水平的生活品质；相反，当生活境遇变差，需要削减开支、降低生活水平时，由于已经习惯了较好的物质享受，不仅心理上难以接受，行为上也可能会产生抗拒或不适，转变回节约生活方式颇具

挑战。所以，奢侈一旦成为习惯，要想纠正正绝非易事，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习惯了好的日子，就再也不愿适应艰苦的岁月。

我们对欲望既不能禁止，也不能放纵，对过度的乃至贪得无厌的奢求，必须加以节制。如果对自己的欲望不加限制，过度地放纵奢侈，没能培养俭朴的生活习惯，必然会使自古“富不过三代”的说法成为必然，就必然会出现“君子多欲，则念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的情况。

第三，成由勤俭，败由奢。

国之兴莫不由于勤俭，国之亡莫不由于奢靡。勤俭使国家兴盛，奢侈使国家衰亡。

春秋时期，戎王派使者由余去见秦穆公。秦穆公听说由余是个贤士，就向他请教：“我常常听人谈论圣人治国之道，但没亲眼见过。请问先生，古代君主使国家兴盛和灭亡的原因是什么？”由余回答道：“臣尝闻之矣，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意思是说：我曾经听说勤俭使国家兴盛，奢侈使国家衰亡。秦穆公听了，不高兴地说：“我虚心向你请教兴盛之道，你怎么用‘勤俭’二字来搪塞我呢？”由余说道：“我听说，过去尧虽身为天下之主，却用瓦罐子吃饭、饮水，天下部落没有不服从他的。尧禅位于舜，舜开始讲究起来，用精雕细刻的木碗用餐，结果诸侯认为他太奢侈了，国内有13个部落不服从他的号令。舜禅位于禹，禹则更加讲究了，制作了各式各样精美的器皿供自己享用，奢侈得更加厉害了。结果国内有33个部落不听他的号令。以后的君主越来越奢侈，而不服从号令的部落也越来越多。所以我说勤俭是兴盛之道，奢侈是败亡之源。”这一番话说得秦穆公连连点头称是。此后，唐代诗人李商隐根据这个故事，写了一首《咏史》。诗的前两句是：“历览前贤国与家，成

由勤俭破由奢。”后来，“成由勤俭破由奢”演变为“成由勤俭败由奢”，并作为谚语流传下来，以此告诉人们，勤劳俭朴有助于事业的成功，贪图享受则会带来严重的恶果。

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勤俭治国必得善果，骄奢淫逸必遭祸端。秦穆公因信奉“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的理念，为后来的统一打下了坚实基础；汉文帝崇尚节俭，力戒奢侈，遂有“文景之治”；隋文帝力除侈靡之风，“务从节俭，不得奢人”，使隋朝迅速强大。穷奢极欲导致身死国灭的教训亦是屡见不鲜。夏桀、商纣亡于奢靡无度，荒淫暴虐；秦始皇兴建阿房宫，豪华盖世，终为楚人一炬；隋炀帝沉迷于灯红酒绿，不理朝政，下场是身首异地。

司马光对物质生活的态度令人感叹。他身居高位，却清正自守、克己奉公，人的物质观往往就是他的价值观，最能反映其人格境界和做事方式。司马光所处的时期，经济繁荣、天下承平，士大夫们沉迷享乐，竞相以奢华为荣，而司马光独能保持头脑冷静，居安思危，此家训既是诫子，亦是表白自己不与世人同流合污的清慎品格。据《宋史·司马康传》记载，司马康成年后，为人审慎俭素，为官清廉方正，“途之人见其容止，虽不识，皆知为司马氏子也”。可见，司马光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后辈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皆有其节俭清廉之风。

司马光的《训俭示康》虽为家训，然其蕴含的深刻道理，当超越一家一族之界限，成为天下人涵养官德、砥砺修身的警世恒言。做人当以俭为本、以俭为美、以俭为上，为官要正世风、政风、民风，当先正家风。



藏书家惜书，多钤藏书印。藏书印是藏书活动的产物，也是藏书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印文内容既有对藏书所有权的声明，又有对收藏者情感、精神的表达。今从前人记录和本人所见藏书印中整理一些反映典籍保护的内容，以窥探古人守护典籍之情和赓续文脉之法，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爱书

古代藏书家为了传承典籍，省吃俭用，典产置书，还会对一些典籍进行仔细校勘，对典籍充满了深厚的感情，视它们为珍宝，有的藏书家甚至视其为生命的一部分。上海博物馆藏宋景定二年金华双桂堂刻本《梅花喜神谱》二卷上有清代藏书家吴湖帆“湖帆宝此过于明珠骏马”的藏书印，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学易记》四卷上有一方朱文长方印“妙书奇画骏马名花”、明崇祯间刻本《梦溪笔谈》上有一白文方印“酷嗜诗书不计贫”、清道光间刻本《见山楼诗钞》二卷上有一白文随形印“老病犹未未见书”，这些无不表达了印主对所获难得之物的珍爱之情。清代福建藏书家萧梦松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以身侍之，罔敢失坠”、“……家藏四世以身守，准得吾书视此谿”。两方藏书印亦告知后人要以身守书。

这类藏书印的内容主要是告诫子孙或后之收藏者，要爱护图书，使之流传更久远，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为述得书不易，要守之珍之。如明代藏书家祁承爌的“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明翁铭”，晚清藏书家沈德寿的“辛酉置书以遗子孙永守”，清代藏书家陈鱣的“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清代藏书家沈廷芳的“购此书，甚不易，遗子孙，弗轻弃”，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七年刻本《冬心先生集》四卷卷首有一方内容相似的藏书印“得此书，良不易，后之人，弗轻弃”，等等。

二为警告子孙，需借不孝。如杜暹的“霰及借人为不孝”，吕伯龙的“吕氏藏书，子孙是教，借毁及售，均为不孝”，吕北野的“吕氏典籍，传家读书，子孙共守。不许损失借卖，违者室祠除名。万历七年坤记”，等等。

三为主张书为公器，得者珍之。如刘禅的“书非自私，得者珍之”，清末民初实业家、政治家汤寿潜的“见即买，有必借，窘尽卖，高阁勤晒，国粹公器勿污坏”，等等。

护书

明代陈继儒《读书十六观》中有元初书法家、诗人赵孟頫的一则跋文，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法。”此为“六勿”，常被后之藏书者所引用，并衍生为“八勿”“九勿”“十勿”等护书之法，这于今日之古籍保护亦有重要的意义。

清代藏书家徐时栋曾刻有一枚藏书印，上书：“烟屿楼藏书约：……勿巧式装潢，勿率意涂抹，勿出示俗子，勿久借他人。”将“六勿”衍生为“十勿”，对藏书提出了更全面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勿巧式装潢”与今天古籍的“修旧如旧”很是契合。

清末藏书家杨继振收藏甚富，有一枚朱文长方印，共252个字，文曰：“予席先世之泽，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请更衍曰：‘勿以鬻钱，勿以借人，勿以贻不肖子孙。’”星凤堂主人杨继振手识……”在这篇印文中，杨氏先述藏书因由，后引用赵孟頫的“六勿”藏书箴言，另衍“三勿”，详述护书之法，特别是“勿以贻不肖子孙”一条，表明印主所藏只传爱书惜书之人，可见其良苦用心。

除了上述赵孟頫跋文入印外，司马光的爱书之法，亦见被引用入印。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一“司马文正光 信阳王氏 遗经堂主人”条记录了明代信阳人王祖嫡和遗经堂主人引用独乐园爱书之法的两方藏书印。信阳王氏藏书印除详细介绍了司马光启卷、观看、翻页等阅读过程中保持图书干净整洁的方法外，还详述了每年晒书的时间、方法以及效果。

藏书印还记录了以芸香草给藏书驱虫的技术。国家图书馆藏清嘉庆十年通谿刘氏刻本《宦游吟》上

藏书印：朱痕上的文脉守护

□ 黄原原

有一方白文长方印“书为香多蠹不成”，记录了香熏可以驱虫的古籍保护方法，这里的“香”指的就是芸香草，现在仍然有很多图书馆用它来防虫。这一印文大概是化用唐代诗人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中的“纸上学香多蠹不成”一句，说明我国用芸香草给书籍防虫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赠书

虽然大多数藏书家都希望其藏书能够子孙永宝，但也有些藏书家把藏书传给自己觉得合适的人。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藏书万卷，将其所藏大部分都赠给了“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蔡邕这种促进典籍物善其用、长久流传的行为对文化发展影响深远，后世多有效仿。这类的藏书印有刘承干的“翰怡持赠”，傅增湘的“沅叔持赠”，吴騞的“知不足斋主人所赠，吴騞子子孙孙永宝”，邵晋涵的“知不足斋主人所赠”，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十二年铅印本《名媛诗归》八卷上有沈敏元的一方白文方印“朴愚谨赠”、清光绪三十四年灵萱室钤印本《慎宜轩文》五卷上有“杭徐阿仲可赠”，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刊本《雅熙乐府》二十卷上有江标的“建霞持赠”、清光绪十年傅以礼家抄本《张忠烈公文集》七卷上有傅以礼的“节子持赠”，上海图书馆藏叶恭绰旧藏《兰亭志》十一卷上钤有朱文椭圆印“叶恭绰举赠”，等等。还有钤印在捐赠给学堂图书的印，如清代黄树谷将自家藏书藏于广仁义学，并号召其他藏书家捐书，供人借阅，并刻一方朱文长方印“敬以此书义助于浙江杭州府武林门外广仁义学，永远为有志之士公读者”，钤盖在捐赠的藏书上。日本元禄庚辰刊本《东莱博议》上有朱文方印“岁寒堂所藏，附与明伦堂。敬承蕴义塾，不敢出他方。同门看读者，肃无致孟浪”。此外，还有很多藏书家将藏书捐赠给公藏单位以实现其藏书的永久流传愿望，如周叔弢、傅增湘、徐恕、叶景葵等。上海图书馆藏王培孙的旧藏本每种都钤有朱文方印“王培孙纪念物”。

小小一方赠书印中蕴含着深刻的寓意。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培养个人修养和增长知识的途径。赠书在传递知识的同时，也强化了一种热爱智慧的理念。书籍中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可以启迪人们的内心世界，激励人们勇于面对挑战、坚定信念，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共勉中华文脉的传承与守护。

